

葛中选『太律』的史实及其音系

张玉来 高龙奎 戴飞◎著



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专刊
汉语语言文字学前沿丛书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葛中选『太律』的史实及其音系

张玉来 高龙奎 戴飞 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南京大学九八五三期项目经费
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专项资金

经费资助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葛中选《太律》的史实及其音系 / 张玉来等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4. 10

ISBN 978-7-5161-4966-9

I. ①葛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乐律学-研究-中国-明代 IV. ①J61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41806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
责任编辑 任明

责任校对 安然

责任印制 何艳

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
邮编 100720

网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发行部 010-84083685

门市部 010-84029450

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

版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×1000 1/16

印张 12.5

插页 2

字数 217 千字

定价 4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4083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总 序

语言(含文字)是人类文明的显性标志,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载体,本身也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。汉民族是在早期人类群体基础上产生、发展而终至形成的人类民族之一。汉语及其方言作为汉民族文化的一部分,其产生形成的过程自然也相当悠远。历史上夏、商、周三代先后相承,文化相因,一定存在某种相关的语言形式。至迟到春秋时代,汉民族共同语的早期形式——雅言就有了明确的记载。《论语·述而》:“子所雅言,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礼皆雅言也。”雅言即正言。这说明,孔子是讲共同语的。孔子周游诸夏列国,并无语言障碍,说明这种雅言是通行范围很广的具有权威性的共同语。汉民族长期以黄河中下游的丰镐汴洛地区为政治、文化中心,华夏核心即成长于此,雅言也当以中原某一方言为基础扩展而成,至迟在春秋时代,雅言已延伸到燕、齐、秦、楚、越诸地区。秦汉之后,境内各民族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方面不断交融,其结果无论是语言上还是政治、文化上,汉文化都是胜利者。在这一过程中,汉语(共同语和方言)不断扩张,以其人口和文化的优势北上南下。因时代与区域的不同,汉语保持着众多的方言,并大致维护着雅言延续下的共同语形式,并对各方言施加影响。

汉语共同语的形成是汉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,是汉民族统一文化的重要内涵。与汉语相适应的汉字,从甲骨文产生以来,就一直是记录汉语的书面符号,是汉语书面语表达的主要手段。汉民族悠久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就是用汉语汉字记录、保存并留之后代、传之远方的,世界上没有几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拥有如此丰厚的历史文献。

汉语言文字学,就是以汉民族的语言文字为研究本体,古称小学,是中国学术体系的根基性学科。自汉代产生的文字学、训诂学、方言学及稍后产生的音韵学,构成了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学科框架。汉代以降,迄至清代,汉语言文字研究无不在汉代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发扬光大,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经典,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。章太炎曾说:“盖小学者,国故之本,王教之端,上以推校先典,下以宜民便俗,岂专引笔画篆、

缴绕文字而已。苟失其原，巧伪斯甚。”（《国故论衡·小学概说》）

我国历史上，汉语言文字学不乏熠熠生辉的名作巨制，但并没有形成真正具有学理性、系统性的语言学学科，在传统学术体系里一直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。戴震说：“经之至者，道也；所以明道者，其词也；所以成词者，字也。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。由文字以通乎语言，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。”（《戴东原先生集·古经解诂沉序》）解读经典文献是传统汉语言文字学的主要任务。

从 17 世纪开始，西方列强海外扩张和殖民运动风起云涌。19 世纪中叶，英帝国主义轰开了中国的门户，1840 年爆发了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鸦片战争。中国从此成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，国力衰落，逐渐丧失了文化的自信和政治的独立。1895 年甲午海战失败，中国陷入了亡国灭种的险境。在这近百年的历程中，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破碎，被迫面对西方文化冲击，进而发生历史转型。学习西方——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。1919 年爆发的“五四运动”就是这一历史积累下的能量的总爆发。“五四运动”是中国近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性的标志事件，从此，中国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全面向现代社会转型。在西学的刺激和碰撞过程中，中国的民族精英开始了全面的对中国文化和学术道统的反思，在反思中，中国学术完成了现代性转型。

在这个风雨如磐的时代，承续乾嘉学风的章黄学人最早体认到了汉语言文字学转型的重要性。章太炎 1906 年发表《论语言文字之学》，指出：“今日言小学者，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。实则小学之用，非专以通经而已。”（见《章太炎讲国学》，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版）章太炎头一次明确提出了语言文字学的学科“非专以通经而已”。汉语言文字学挣脱经学的藩篱，独立为一个学科，是汉语言文字学向现代学术转型的重大变化。现在，我们无论称呼“汉语言学”还是“汉语言文字学”，都已远非传统“小学”所能概括的了。两者在研究目的、研究方法、研究手段上都已经发生了质的不同。

汉语言文字学的学术转型，是在全面接受西方语言学思想、模仿西方研究范式的历史洪流中完成的。这一转型的标志是 1898 年马建忠的《马氏文通》问世。何九盈说曾经说：“跟西方现代语言学相比，我们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带有补课的性质。泰西的‘葛郎玛’，历史比较法，对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，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。”（《中国古代语言学史》，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）马建忠之后，汉语言文字学的许多方面都蓬勃发展起来了，虽然不乏机械模仿甚至抄袭之作，但是，研究范式已经与传统小学大相径庭。此后，胡以鲁（1913）的《国语学草创》、钱玄同（1918）的《文字学音篇》、高本汉（1915~1926）的《中国音韵学研究》、赵元任（1929）

的《现代吴语研究》、唐兰（1934）的《古文字学导论》、陈望道（1932）的《修辞学发凡》等著作相继问世，这些著作标志着我国汉语言文字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型成功。

近百年来，汉语言文字学在学习、模仿、融会西方语言学研究范式中匍匐前进。模仿是创新的母体。在西方语言学影响下，汉语本体研究的诸多方面都突飞猛进，尤其是在民族性、地域性较强的音韵学、古文字学、方言学、历史词汇研究、古文献训释等方面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然而，这就像我们的很多国术，比如中医一样，举世无双，研究水平也很高，但这些成就不能说明中国的医学就具有了世界水平。同样，一个专门研究莎翁剧作或专门研究海明威小说的西方学者，如果他从中没有研究出具有认识论价值的文学理论，我们也不能说他的研究成果就具有世界影响。

毫无疑问，直到今天，我们仍然缺乏创新性的理论提炼。我们在汉语言文字研究的诸多领域，仍然是跟在西方学者创造的理论背景下开展工作。只要不带偏见的学者，都会体认到这一现实。因此，如何在汉语的本体研究中，提炼出富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的认识体系，将是汉语言文字学任重道远的任务。

我们勾勒汉语言文字学的学科发展过程，目的是要说明，汉语言文字学要不断开拓创新，才能获得学术价值和学术生命。这个学科不仅要为解读传统经典文献服务，更要解释汉语自身的历史演变和自身构造，还要担负起总结、抽绎人类语言发展和结构规律的任务。在信息化的时代，还要参与到科技范畴的创新。

学术史学者方松华曾说过下面一段话：“在春秋战国这一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、百家争鸣的大时代，各种思潮和学派蜂拥而起，这是中国学术思潮的原创时代，也是后来诸多思潮和学派的原型。儒、道、墨、名、法、阴阳等诸子百家尽管学说不同、方法各异，但对天地宇宙、自然人生、仁义礼智等都有共同的研究、讨论的兴趣，特别是某个学派共同的基本信念、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常常可以汇聚数千门客，从而形成该学派的传统，传承无数年代。先秦多元学术的这种‘范式’在西汉‘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’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惨遭终结。”（《近百年中国学术思潮反思》，《上海行政学院学报》2004年第5期）

我们所期盼的，也正是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也能够秉承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传统，在吸收、融合世界优秀语言学成果的基础上，汉语言文字学能够产生一批具有原创性的、扎根汉语事实的、带有民族气派的、富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的论著，真正成为世界语言学的前驱。

二

我们南京大学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，源远流长，百年弦歌，不绝如缕，名师荟萃，英才辈出。从三江师范学堂（1902~1906）到两江师范学堂（1906~1912），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（1914~1921）到国立东南大学（1921~1927），从中央大学（1928~1949）到南京大学（1949~），我们可以列举出一批称为大师或名师的名字：王伯沆（1871~1944）、黄侃（1886~1935）、汪辟疆（1887~1966）、胡小石（1888~1962）、汪东（1890~1963）、马宗霍（1897~1976）、方光焘（1898~1964）、黄淬伯（1899~1970）、张世禄（1902~1992）、洪诚（1910~1980）、鲍明炜（1919~2007），等等；我们也可以列举出一批誉满语坛的毕业生：吕叔湘（1904~1998）、潘重规（1907~2003）、殷孟伦（1908~1988）、高明（1909~1992）、殷焕先（1913~1994）、周法高（1915~1994）、李孝定（1918~1997）、张志公（1918~1997），等等。一百年来，南京大学汉语语言文字学凝练出了自己的学术道统，体现了扎根传统、求真务实；砥砺气节、尊师重道；兼包并蓄、勇于创新的学术风格。

从一开始，本学科就秉承了乾嘉的朴学精神，朴学曾是三江师范至中央大学时期的学术招牌，特立独行的黄侃先生最具代表性。他视学术如生命，勤勉一生，为学一丝不苟。他曾有名言说：“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，皆由辛苦，鲜由天才；其成就早者，不走错路而已。”这种朴学精神凝化为本学科的底蕴。

崇尚朴学并不意味着本学科一味抱守传统，而是兼容并蓄、勇于创新的。吕叔湘、张世禄、周发高、李孝定、殷焕先等都是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。东南大学时期的陆志韦（1894~1970）本是心理学、教育学专家，但他后来勇于学习高本汉，竟然成了现代汉语音韵学的开拓者。长期在南京大学执教的方光焘先生留学日、法，深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，他积极参与文法革新和言语与语言的讨论，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黄淬伯更是师承清华国学院的学风，在音韵学研究上走的是现代与历史结合的道路。鲍明炜开拓了现代江苏方言研究的一片天地，新中国成立后的毕业生中有一大批人走上了现代语言学的征途。

本学科在发展中，强调学术与才情不悖，语言学并非与文学艺术绝缘的学科。老师胡小石、黄侃都擅文艺，学生周法高、殷孟伦、殷焕先都是旧诗高手，蒋维崧则是书法篆刻名家。

目前，本学科在传统的音韵学、文字学、训诂学、古文字学、文献训释等领域后继有人，强力进取；在现代的语法学、方言学、汉藏比较语言学、

语言规划、社会语言学等领域不落人后，并有特色。

近年来，学术功利化、物质化搅扰着学术的灵魂，致使我们学科的发展确实面临着一些困难。但是，这些困难必将是我们图强的动力。《诗》云：“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”，这本是自然规律，一个学科的发展也不外于此。本校故学监清道人李瑞清先生激励两江师生的校训是“嚼得菜根，做得大事”。我们已经迈过了咀嚼菜根的苦难时代，但是，如何做得了大事，却在烤炙着本学科每一位学人的灵魂。我们有百年学术精神的激励，也有不甘人后的勇气。只要坚持朴学与新学并存、传统与创新共荣、汉学学脉与西学学统争鸣的学术精神，我们相信，南京大学的汉语言文字学科一定还能继续辉煌下去。诗仙有言：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这就是我们的信心！

我们尝试着探索、尝试着创新，这套汉语言文字学前沿丛书就是我们努力的成果。通过这套丛书，我们向学界请益，期盼着前辈时彦给以批评、给以鼓励！

是为序。

张玉来

2013年5月31日

序

葛中选是明末著名的乐律、音韵学家。葛氏《太律》一书是一部重要的乐律学、音韵学著作。该书套用乐律等理念分析语音，致其难读。但是，只要把那些跟语音分析相关的乐律成分剖析清楚，就显现出了葛氏设立的各种语音分析范畴。该书前五卷所载的五种不同编列方式的韵图（音节表）分析讨论了当时的官话语音系统。《太律》所创立的语音分析范畴及其别具风格的韵图（音节）编排方式，显示了葛氏对语音的精到分析和翔实的音系描写。这些成就表明，《太律》在汉语音韵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近二十年来，我花了不少时间解读《太律》，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看法，拟就了一份详细的写作框架、写作细目并写成了部分章节。学生戴飞、高龙奎先后在我的框架基础上，参与研究和写作工作。而后，我差不多又花了两年时间，在戴飞和高龙奎的基础上做了大幅修订，添加了不少内容，就成了现在奉献给大家的这部著作。

《太律》的很多内容涉及古代乐律的专门知识，然而，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有限，只能尽我们的能力作了一定程度的解读，恐以浅薄见笑方家。

本书所引论著一并开列于书末之“参考文献”，正文中一般不予注出书名，只称引作者及其论著的发表年份，注明页码，以节省篇幅。常见古籍就直接引用不再标注具体版本页码了，这是我特别要说明的。

我很怀念与两位相与切磋的时光，这本书记录了我们师生挥洒汗水的辛苦与收获果实的喜悦，青年学人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。我想，这本书所表现的精神将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。

作为老师，书中所有的不足和缺点都应由我负责，欢迎方家批评指正。是为序。

张玉来

2014年3月3日

于南京大学双杏斋

目 录

第一章 与《太律》有关的史实	1
第一节 《太律》的作者及成书	1
一 葛中选生平	1
二 《太律》的成书	9
第二节 《太律》的版本及流传	10
第三节 《太律》的内容	16
一 《太律》的内容安排	16
二 《太律》各卷的内容	18
第四节 《太律》研究概况	19
第二章 《太律》的乐律研究	22
第一节 古代乐律的主要范畴	22
一 五音、七音	23
二 十二律	26
三 正律、倍律、半律	29
四 旋宫与均	29
五 乐律分析范畴的来源	29
第二节 《太律》的乐律研究	31
一 《太律》对古代乐律的阐释	31
二 《太律》中乐律与语音相结合的分析方法	38
第三章 《太律》的语音分析	41
第一节 《太律》的语音分析范畴	41
一 关于声母的分析	42
二 关于韵母的分析	46
三 关于声调的分析	53
四 关于音节拼合的分析	54
第二节 《太律》前三卷的韵图	58

一 “太律音专气音”图	58
二 “太律声专气声”图	62
三 “太律直气位”(“直气声音定位”)图	67
第三节 “和音”图与“应声”图	69
第四节 《太律》的语音史价值	74
第四章 《太律》音系分析	77
第一节 《太律》的声母系统	78
一 有关声母特点的讨论	78
二 声母表	87
第二节 《太律》的韵母系统	87
一 各类韵母的讨论	87
二 有关韵母结构特点的讨论	100
第三节 《太律》的声调系统	107
一 平声分阴阳	108
二 浊上变去	109
三 入声独立	109
第四节 《太律》的语音性质	109
第五章 《太律》音节表	113
附录	158
一 葛中选《太律》卷三	158
二 葛中选《泰律含少论》	170
三 葛中选《河西县城祠记》	175
四 葛中选生平史料	176
五 《太律》序跋集	182
六 金声生平史料	185
参考文献	188

第一章 与《太律》有关的史实

第一节 《太律》的作者及成书

一 葛中选生平

《太律》(又名《泰律》、《泰律篇》),十二卷,外三卷,明人葛中选著。据清乾隆五十三年(1788)董枢、罗云禧等修纂的《河西县志》卷三“乡贤”载:

葛中选,字澹庵(渊),由举人仕至苑马寺正卿。博极群书,精于易象,而尤留心律吕,不由师传,心解神悟。自为诸生及服官,日讨求其故,著《太律》,作阴阳图,以六十四卦配,精深奥衍,人无知者。焦学士兹称其“得千古不传之秘”。为嘉鱼令,识金学士声于童子,引入署教之。声遂以文雄天下。怀宗召声问天下奇才者,首举先生对。时先生已归,会声被谮,诸事遂寝。先生磊落英多,好谈兵事,仕粤屡著战功,详载墓志中。先生生平精力粹于《太律》一书,以其余为画,亦与董思伯^①齐名,居八咏楼之一,墨牡丹尤妙。性好石,致政归,择云岫石居,以林泉自娱。子慎修亦善诗。卒葬宜良汤池。康熙四十七年学使魏公方泰得其书,异之,抄副本载归,识者曰:“雅乐之亡,由黄钟不协,先生书可以上求元音,非三代后所及也。”今天下绝学彰明,惟律吕尚多未备,元运昌规必有卓绝之士继起而发其蕴者,神物显晦有时,岂终泯乎?康熙三十八年祀。

民国三十八年(1949)龙云、卢汉主持纂修的《新纂云南通志》卷一百

^① 董思伯,陈荣昌跋文作“董宗伯”,疑当是“董思白”。据《明史·列传第一百七十六·文苑四》:“董其昌,字玄宰,松江华亭人。举万历十七年进士……其昌天才俊逸,少负重名,精于书画,自成一家,名闻外国,尺素短札,流布人间,争购宝之。”董其昌本无“思白”之号,但郑威《董其昌年谱》(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版,第10页)据《陈眉公先生集》卷三十六《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思白董公暨元配诰封一品夫人龚氏合葬行状》云:“公讳其昌,学者称思白先生。”因此,“思白”不是号,也不是字,而是学者对董其昌的称呼。“思伯”、“宗伯”或为“思白”之别称。《新纂云南通志》即作“董思白”。

九十二“葛中选传”综合旧时史料，载之最详：

葛中选，字见尧，号澹渊，河西人也。幼颖异，读书城东北云峨石山中，九载始归。中万历庚子举人。

初任湖北嘉鱼县，勤教养，号称政平讼理。金声，其所拔士也，试举首，饮食教诲者六年，卒以文雄一代。任满，升南京大理寺右评事。寻出守广西思恩府，奉命讨余大头之乱。平之，升右江兵备道，旋有广西按察副使之命。时贵州苗乱作，聚众万馀围安顺，朝命率六千人相机剿抚。中选由黄草坝驰往，连战皆捷，围遂解，贼退入芭蕉关死守。中选挑敢死士二百人，佯以大兵攻关，亲率二百人缒悬崖，择要地伏截之，复率精武术、力敌百夫者十馀人，直入贼酋卧室，擒其三，格杀百数，纵火焚其巢以为信，内外夹击。贼溃，令降者免死，并开诚激以义，晓以祸福，皆罗拜，感激泣下。捷闻，蒙优奖，擢陕西苑马寺少卿。时马政失修，有司中饱马价，厩皆劣驹，数且不及半。中选力剔积弊，不二年，得战马万馀，公卿交章荐。

熹宗亦闻其才，顾以魏阉当国，中选乃致仕归，沐藩天波师事之。崇禎己巳，怀宗召问天下奇才，金声首以中选对，并致书云南巡抚蔡侃，侃亦深致礼敬，为多士倡。

中选博极群书，精易象，尤留心律吕，心解神悟，不由师传，自为诸生及服官，日讨求其故。著《泰律》十二卷，作《阴阳图》，以六十四卦配，精深奥衍，人鲜知者。焦竑称其得千古不传之秘，金声称为学悟精绝，跨越秦、汉而上。又谓：“吾师之学，声不能窥其万一”云。徐如《赤壁集》、《尘中言》、《衡湘小述》及《诗文集》若干卷，因李定国^①屠河西尽毁。复善画，与董思白齐名，居八咏楼之一，墨牡丹尤见重于世。书法小楷学钟，行书学米，皆为世所称。以崇禎十四年卒。清康熙三十年，从祀乡贤，并祀嘉鱼名宦。子慎修，精内典，善诗文，著有《拜石山房集》。周天任撰《神道碑》、葛在庭撰《事略》、《云南通志》

赞曰：孙（疑误，当为“孔”）子之门，六艺皆有传人，而乐久亡者，何也？以声音须口授，非若文字可以乞灵简册也。中选独成此绝学，奇哉！又善用兵，曾以《阴符》、《龙韬》、孙、吴《兵法》等书授金声，真豪杰之士也已！

^① 李定国（1621—1662），字宇宇，陕西榆林（或作延安）人，原为明末农民义军将领，后为南明永历政权抗清名将，在云南抗清多年，曾屠河西县。（见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《陕西省志·第七十九卷·人物志上》，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540页。）

葛中选的事迹还见于光绪年间昆明人陈荣昌^①为《泰律》作的“后跋”。该跋文说：

予闻河西葛澹渊先生《泰律》之书久矣。求之不得，继乃得于先生九世孙振鹭^②家。当其时，今中丞林赞虞前辈任滇藩，重刻《滇南文略》、《诗略》之属，嘱予呈此书。中丞立措资，嘱张竹宣广文付梓。既竣事，振鹭据邑志及家乘录先生轶事，请附简末。其略曰：

“澹渊公，生明季。甫三岁，能辨鸟音。少长，读书云莪石，九载始归。同里徐、耿二巡抚异之。

万历间，以孝廉授湖广嘉鱼县，累官苑马寺卿。公之学首音律，次文艺，尤善诗画。自为诸生及服官，无日不披吟综览群书，精易象周礼，作阴阳图，以六十四卦配为阴阳之声，与五音交而成《泰律》一书，精深奥衍，人鲜知者。其诗文皆载县志。画与董宗伯齐名，居八咏楼之一，墨牡丹尤见重于时。又善兵，仕粤屡著战绩，详在墓志中。金文毅额其庐曰‘绝学名儒’。

初，公之宰嘉鱼，识文毅于童子，引入署教之，遂以文雄天下。明怀宗问天下奇才，文毅首举公对。时公已归林下，会文毅被谮，事遂寢。

公居官二十余年，政迹遍湖浙黔粤秦陇间。归后仍养性云莪石，以山水音律自娱。

子慎修亦以孝廉授贵州平越府，工词章，载《滇南诗略》。而《泰律》则莫之知也。

国朝康熙间，学使蔡公方泰^③见《泰律》，钞以归，曰：‘雅乐之亡，由于黄钟不协，先生之书可以上求元音，非三代后所及。’”

予既嘉振鹭能守先人遗书，又能述轶事，诚贤子孙也。而中丞表彰是书，尤令人感激。使国初修四库求遗书时，得如中丞其人者，何至吾

① 陈荣昌（1860—1935），字筱圃，昆明人。光绪十九年（1883）进士，授编修，督学贵州，迁山东提学使，归滇后主讲经正书院。（见《云南省志》卷八十《人物志》，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491—493页。）

② 葛振鹭，字在庭，葛中选后人，1881年生，曾留学日本，在云南省政府秘书处供职多年，著有《滇戏考》三卷及《抱朴堂诗文集》等。（见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编《云岭拾穗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40页。）又据《通海县志》（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734页），葛振鹭曾参与编修《续河西县志》。

③ 陈荣昌跋将“魏公方泰”误为“蔡公方泰”，《河西县志》即为“魏公方泰”。魏方泰（1656—1727），字日乾，号鲁峰，江西广昌人。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进士。康熙年间曾任提督云南学政，历任通政司参议、左金都御史、太常寺卿、詹事等。（见同治《广昌县志》卷六《人物志》。）

乡先正之书为李湖^①所遇，竟湮没而不传哉！振鹭所藏本，乃金文毅原刻，今悉仿其式重刊之，而原本仍归之葛氏，俾使世守云。光绪甲辰六月昆明陈荣昌谨识。

另外，乾隆《云南通志》、清人师范纂《滇系》（1808）等文献也简单记载了一些葛氏的情况，与《河西县志》所载略同，今不具引。

关于葛氏先世的源流，《甸心行政村志》据《葛氏家乘》^②等材料考证，河西葛姓始祖葛性诚，原籍四川成都府华阳县，由元进士于至正年间任云南廉访使。因元亡而卒于官，其子惟孝落籍河西县城，并在新增尾置有田产，至明嘉靖时八世祖葛映明、葛映微弟兄迁来祖业田边落籍，始称葛家庄，后称葛家营，至今葛家营葛氏已传至二十三代。葛中选是迁河西的葛氏第九代。

上述文献大致记录了葛氏的主要生平事迹。根据有关资料，我们可粗略地编订葛氏的行年如下：

1577年，葛氏生于云南河西城内。葛氏家族在河西新增尾、葛家营有祖产，并有家业。葛氏少有文名，“通鸟音”，在云峨石下读书九年。

《甸心行政村志》称葛氏1577年生，即万历丁丑年，但没有说明依据。今通海县河西镇葛家营存有葛中选始编并经其后人多次续编的《葛氏家乘》，想必上述说法就是据《家乘》而来，当言必有据。又，据葛在庭《先见尧公事略》称葛氏“弱冠中万历庚子科举人”，古称20多岁为弱冠，由万历庚子（1600）前推20多年，时间大致吻合。

《河西县志》卷一：“云峨石，在县东北五里解家营。石甚古，其高数丈，壁石峥嵘，旁石曲折，有喷雪岩、云和洞诸胜。溶湖在前，藤萝满径，幽人之居，气韵天然……邑人澹渊先生尝卜居于此，闭门著《太律》……故址尚存。”

1600年，中万历庚子科举人。

今所见文献皆称葛选中万历庚子科举人。《河西县志》卷三“选举”

① 李湖（？—1781），字又川，江西南昌人，乾隆四年进士。乾隆三十七年，署云南巡抚，后实授云南巡抚。乾隆四十三年，任湖南巡抚。乾隆四十五年，任广东巡抚。（见《江西省志·人物志》，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251—252页。）李湖任云南巡抚间阻止将明代云南人著作上送朝廷，《太律》即在其中。

② 据《甸心行政村志》（杨应昌主编，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107页），《葛氏家乘》为葛中选首修，清代乾隆、嘉庆、光绪间族人多次补修，全书分为七卷，记事详尽，条理分明。20世纪90年代，族人葛世尧等再次续编，增补至二十三世，复印若干本分由葛姓族人收存。

万历庚子科举人有“葛中选”。

1610—1617年，出任湖北嘉鱼知县，有政绩，县民为其立生祠。发现、培养了明末抗清英雄金声。

据《嘉鱼县志》，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五年（1610—1617）葛中选任知县，其前任是王尧臣，后任是唐国土。

据《嘉鱼县地名志》：“明万历庚戌（公元1610）嘉鱼知县葛中选，因培修四邑公堤有功，县绅在河泊矶上为他修了一座纪念建筑，名‘葛公生祠’，清同治年间败毁（清同治五年《嘉鱼县志》）。”

《休宁县志》卷三十三“人物”：“金声11岁时随父到湖北嘉鱼县投师受教。”金声生于1598年，11岁即是1609年，那么，葛氏识金声当在声寓籍嘉鱼的第二年。

1617年出任南京大理寺右评事，并参加灵谷之会。

金声《澹渊先生泰律序》：“未几而师移南都，余日长大，曾走师署，杂叩所学，仓卒间，昏钝亦不能领也。”按：由此可见，葛氏1617年离开嘉鱼任后，到南京任职，期间金声曾经拜访其师。

《甸心行政村志》：“中选在嘉鱼任满七年，升任南京大理寺右评事。”

焦竑《太律》题辞：“周莲勺、董见龙、钟伯敬订灵谷之会，一听见尧呼律。余忽动足疾不能从焉。”

按，焦竑的题辞写于万历戊午秋，即1618年。这说明《太律》在此前已经成书。焦氏所谓“灵谷之会”必在1618年或1618年之前。根据史料，董应举（1557—1639），字见龙，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考中进士，1618年前后任南京大理寺丞；焦竑（1540—1620），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因主持顺天乡试出误被弹劾，贬为福宁州（今福建霞浦县）同知，翌年再遭降贬，为此愤而辞职，回宁定居。不多久，焦竑复被起用，任南京国子监司业，并主讲南京钟山书院。显见，焦竑自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即定居南京；钟惺（1574—1624），字伯敬，湖广竟陵（今湖北天门市）人，1617年任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，迁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。由上可知，焦竑提及的这几个人，1618年都在南京。葛氏1617年到南京，当与这些名流交往唱和，遂有灵谷之会。这个会议的时间当在1617年到1618年秋季之间。

1618年秋，焦竑为《太律》题辞。

1621年知广西思恩府，后升按察使司副使等。

《广西通志》卷三十四《职官表》二十二明十一“天启朝”：“葛中选，河西人。元年，思恩知府，加副使，节制土司。”天启元年即1621年。

《明实录·熹宗实录》卷二十九：“天启二年（1622）十二月壬申兵部覆广西巡抚何士晋疏言：思恩知府葛中选，忠义激发，为泗城、田州二司所信服，宜加副使职衔，暂委监军，节制土司。”

《明实录·熹宗实录》卷三十九：“天启三年（1623）十月丁卯……今尊旨调发士兵……田州出兵六千，亦于去冬即入滇境，滇之叛目李保听安酋（效良）嗾使，拒阻田兵，监军葛中选以事关邻封，不敢纵田兵擅杀，改调安隆司兵见救安笼所（今贵州安笼）……”

《熹宗实录》卷五十七：“天启五年（1625）三月庚戌，升广西思恩府知府加副使衔葛中选，为本省按察使司副使，分巡府江道。”

1626年升任陕西苑马寺卿。

《熹宗实录》卷六十三：“天启五年（1625）九月丁巳，升……广西副使葛中选为陕西苑马寺卿。”

《向心行政村志》：“正值马政失修多时，皆因有司中饱私囊，马少厩劣。中选到任，力剔积弊。不二年，得战马万馀匹，公卿交互上奏推举，熹宗亦闻其才，欲重用。”

1628年辞官归故里，在云峨石下研读。期间，受藩王黔国公沐家聘，为其家师，末代黔国公沐天波受其教。

金声《澹渊先生泰律序》：“已而师经营黔粤秦陇间，余亦困踰场屋。比倖一第，图所以就学，而师归滇矣。己巳之役，承上召对，次问天下奇材，问及师，以远不及，事姑置。”

按，金声中崇祯元年（1628）榜进士，己巳年即1629年。说明1629年前葛氏已经回到云南。

《向心行政村志》：“碍于太监魏忠贤当国，中选不愿受阉人之气而归滇，就沐天波处从事。崇祯二年（1629），怀宗召问天下奇才，金声首推中选。因远在云南而未能用。”

葛在庭《先见尧公事略》：“熹宗亦闻其才，且识鸟音，乃召入宫中，以